

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中华廉洁文化的 旧邦与新命*

余绪鹏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研究院, 上海 201418)

[摘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两创”)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贡献。如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作“旧邦”,那么实现其“两创”便是“新命”。传承中华文化“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传统,回应世界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期待,有助于推进新时代文化繁荣。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拥有的丰富遗产具有重要时代价值,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渊源,为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不竭动力,成为培养干部思维能力的生动教材。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方略,是推进“第二个结合”的现实需要,也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必然要求。针对当前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制约因素,必须在以下方面进一步努力:加强各领域的机制建设,营造有利于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良好环境;抓住人才这一核心竞争力,通过培养文化主体的创新思维意识来增强内在动力;重视并保护本土特色文化资源,运用数字技术优化传统廉洁文化转化发展的方法路径;深化管理体制变革,激励干部在推动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上积极作为。

[关键词] 习近平文化思想 “第二个结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廉洁文化 反腐败斗争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5)02-0014-11

一、引言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这就是当前文化战线上的“两创”方略,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大贡献。《诗经·大雅》有言:“文王在上,于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如果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作“旧邦”,那么实现其“两

创”便是“新命”。传承中华文化“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传统,回应世界对中华文化发展的期待,要在实践中不断更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既有的表现形式并激活其生命力。^[2]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在新时代依然熠熠生辉。鉴于当前学术界更多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对其中的廉洁文化研究较少,本文在习近平文化思想视域下系统阐述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24-08-15;修回日期:2024-09-09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文明论视域中的庄子政治哲学研究”(21BZX085);上海高校智库·美丽中国与生态文明研究院决策咨询课题“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在新时代转化发展的的问题与对策”(SIT-ZK-202410)

作者简介:余绪鹏,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政治研究。

二、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近代著名哲学家冯友兰曾说：“一个学术工作者所应该写的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3](P2)}即便到了耄耋之年，他还在思考着一件大事，“那就是祖国的旧邦新命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前途”^{[4](P183)}。冯友兰的书房挂着一副对联“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上联表达了他的学术志向与目标，下联体现了他理解的一种人生方式与境界。^[5]正因为有着如此高尚的人生追求，他在晚年着手写作并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之所以称之为“新编”，就是以新视角、新方法和新立场去阐述中国传统哲学。

从实践发展来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并不是一个新事物。凡是能够将前世文化在后世发扬光大的举措都可以看作是转化和发展。比如，汉代贾谊对儒家伦理思想进行了高度提升和深度挖掘^[6]，清朝康有为对儒家思想进行过改造^[7]。另外，林则徐、曾国藩、张之洞等一批封建廉吏忠实践履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基本要求，以身作则，正人正己，极力倡导清廉俭朴、勤政务实之风气，并开始将这些思想基因与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联系起来，从而赋予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以新的内涵、使命与责任，为实现廉洁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搭建了桥梁。^[8]

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为文化繁荣发展创造了条件，但在这个时期，西方多元文化不断涌入，中华传统文化日渐式微。不少人认为，中华传统文化本质上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已经不适应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要求。1988年的电视纪录片《河殇》曾引起强烈反响，该片认为，中华传统文化已经终结，新文明不能从旧文明中孕育出来。^[9]然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文化讨论发生转向，国学热在民间兴起，“复兴儒学”的口号也被提出来。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重要资源，用现代观念进行审视和发掘的理性认识一直持续至今。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齐鲁大地，考察孔孟之乡，在山东曲阜首次公开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概念。在此后多个重要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都强调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方略。学术界也掀起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问题的研究热潮，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其必要性、可能性、原则、要求以及实现路径等多个方面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尽管如此，我们发现其中关于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少。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独特价值不容忽视。

反腐败斗争是一项系统性任务。但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人们的价值观存在差异，对待人性、财富、权力乃至规则都会有不同态度，所有这些都对一个国家的廉政状况有着长远影响。^[10]因此，民族文化与廉政建设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同的文化环境孕育着不同的廉洁观念。而这就会影响人们对于腐败的态度，影响国家的反腐败行为。正由于此，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即便有着同样的反腐策略和行动，但却收到不同的效果。而即便某些国家颁布了严格的反腐败法律，也可能无法得到有效的执行，甚至还会导致腐败现象的持续蔓延。^[11]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12]。古代中国文明是与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并列的几大文明唯一延续至今的文明。文化建设有着强烈的路径依赖，必须实现对传统廉洁文化的转化和发展，因此在理论上对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进行专门研究就很有必要。本文在过去学界研究基础上，概括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优秀遗产并探讨其时代价值，梳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阻碍因素，同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建议。

三、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及其历史遗产

长期以来，相关研究主要聚焦“廉政文

化”。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文化,廉政文化更加专注于政治领域内的廉洁从政,其规范对象是掌握公共行政权力的公职人员。廉政文化建设是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侧重于塑造廉洁的公共权力行使主体,营造良好的公共权力运行氛围,克服贪污腐败文化的不良影响。相比之下,廉洁文化涵盖了整个社会的清廉道德、正义价值和善良品格等内容。廉洁文化建设旨在营造一个全社会范围内清廉的文化氛围,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教育熏陶、监督控制及精神凝聚等功能上,作用对象十分广泛。

在文化哲学视野中,中华廉洁文化源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闪耀着民族精神,彰显着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13]从时间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指20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之前的文化。^[14]由此而言,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就是古代中国关于廉洁的系统性思想观念和行为规范,其所包含的许多要素仍然具有珍贵的时代价值。在“古为今用”原则指导下,可以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主要历史遗产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 树立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是指人们在享受安定生活的同时,始终保持警觉,思考可能出现的危机和问题,并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它提醒人们不仅要关注眼前的繁荣和成就,而且在安定的时刻也要保持清醒,不能掉以轻心。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忧患意识起始于周朝。《尚书·周书·周官》中的“制治于未乱,保邦于未危”^{[15](P235)},是最早的文字表述。这种意识集合了超前体验、风险体验和情感体验,涵盖了忧道、忧天、忧国、忧民等多方面的内容。^[16]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强调官员应时刻保持警惕,防范自身权力的滥用和腐败的产生。这种忧患意识使得官员在享受权力和待遇的同时,始终保持廉洁品行。居安思危使得官员们能够审慎行事。“物必自腐,而后虫生”,这是自然现象,也是社会规律。个人在享受安乐时容易陷入奢靡堕落,政权在进入稳定期后容易出现内部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制度在得到良好实施后

也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古代文化典籍中多次强调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提醒君主和官员在安乐时想到苦难,在顺利时想到逆境。为了有效应对潜在风险,还需要具备变革创新的认识,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从而避免个人的失败和国家的灭亡。

(二) 秉持以史为鉴的自省观念

中国古代政治家和思想家深刻认识到,对历史进行反思和总结,能够为现实国家治理提供指导。历代文人都将编纂史书视为重要工作,以记录历史真相,使人们能够从历史教训中获得智慧,避免重蹈覆辙。孔子创作《春秋》一书,希望通过记录历史人物的善恶得失,让后人从中吸取教训。《老子》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认为懂得反思才是大智慧。《论语》中写道:“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吾日三省吾身”,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名言警句。司马迁的《史记》则通过对历史的详细记载和评论,希望“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使人们能够从历史中获取智慧。这种自省观念使得官员更加清楚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只有保持廉洁和公正,才能避免因腐败而生的民心背离,实现官员与民众的和谐相处。自我反省不仅体现在史书中,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悠久的中国古代历史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人们可以看到对于历史教训的文学叙事。例如,杜牧以其犀利的笔触,写出了著名的《阿房宫赋》,发出“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无尽感叹,隐喻着对于唐朝统治者的深刻警示。

(三) 倡导清廉人格的培养造就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官员道德高尚,才有可能抵制腐败,因此为政以德是官员廉洁从政的关键因素,也是其高尚人格的体现,包括清介自守、公私分明、秉公执法和勤俭节约等几个方面。清介自守是一种道德情操。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利益的考验时,为政者能不为之所动,始终保持清廉的作风与品格。《道德经》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孟子》有言:“修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包拯在《书端州郡斋壁》写道“清心为治本”。公私分明是指为政者必须明确公务与私事的界限，不受个人情感和偏见的影响，秉持公正、公开、透明的原则，维护公共利益。为政者不利用职权谋取个人私利，不将个人情感和偏好带入到公务中。秉公执法是指为政者必须坚守公正，不偏袒任何一方，严格依法行政。要摒弃个人好恶和偏见，以客观、中立的态度来处理案件，确保法律得到公正执行。《管子·任法》说：“爱人不私赏也，恶人不私罚也。”勤俭节约是从政者必须时刻牢记的重要原则。这不仅是一种道德责任，更是一种社会责任。需要时刻保持勤奋和敬业的工作态度，同时还要在工作中注重节约资源。甚至需要精打细算，严格控制预算，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论语·八佾》有言：“礼，与其奢也，宁俭。”

（四）崇尚惩贪肃吏的法制文明

为了有效惩治腐败和维护统治，古代法家提出“以法治国”思想，强调必须制定严格的法律制度来惩治腐败，由此而形成一套惩贪肃吏的法制体系。统治者认识到，要有效惩治腐败，必须从立法思想、守法观念和司法制度等多个方面入手，从而形成惩贪肃吏的强大合力。崇尚惩贪肃吏的法制文明，构成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重要内容。以官吏制度为例，在“家国同构”的制度模式下，汉代推出了孝廉制度，将“孝”“廉”作为选拔官员的基本标准^[17]；清代初期将德行作为官员重要选拔标准，推出了“四格八法”的考核办法^[18]。官员被教育和引导遵守法律，恪守法纪，不为个人私利而违法乱纪。他们深知法律的权威和制度的重要性，知道一旦违反法律和纪律，将会受到严厉的制裁和惩罚。因此，他们更加谨慎行事，时刻警醒自己。事实证明，凡是历史上的盛世时期，都呈现出廉政法制健全、治吏措施有力的特点。例如，唐朝的“贞观之治”时期，皇帝倡导廉洁从政，实行了一系列严格的廉政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同样，一个王朝的衰败往往源于法制松弛和监察失效。例如，明朝末期，官员贪污受

贿，治官制度名存实亡，最终导致了王朝灭亡。

四、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

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凝聚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无穷智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展现出独特优势，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起到重要作用，服务并维系着古往今来大一统体制的持续运转。^[1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上发生过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为今天的镜鉴。”^[20]在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时代价值正栩栩生辉。

（一）推进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渊源

文化自信不仅包括对与道路、理论和制度相伴随的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自信，还包括对作为“源头形态”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21]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12]中华传统廉洁文化是增强新时代文化自信自强的历史渊源之一。首先是重民思想的延续。儒家思想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必须顺应民心、节俭爱民，勤政恤民。这些观念与现代民主观相呼应。虽然古代民本主义中的“民”并非今日意义上的“公民”或“人民”，但其所蕴含的“保民”“怜民”“爱民”的重要意义不可忽视。重民思想为现代民主思想提供了合理内核，有学者提出“民本主义民主”，被认为是传统文明的时代性转化。^[22]其次是诚实守信的传承。《论语·子路》有言“言必信，行必果”，《大学》中提到“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一个君主如果能够做到这点，就会赢得民心，使国家安定繁荣。现代社会，“要把诚信作为现代社会文明之基”^{[23](P219)}，需要弘扬传统美德，推动现代信用建设，让诚实守信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再次是公平正义的追求。古代廉洁文化对于贪污腐败持强烈谴责态度，视之为道德沦丧，根源就在于其破坏公平正义，损害社会成员间平等占有和使用社会资源的原则，因此公平正义自古以来就是人

类的价值追求。^[24]最后是法制观念的发展。古代统治者认识到,要有效惩治腐败,必须从立法、守法和司法等多个方面形成强大合力。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法治、文明的价值观相契合。

(二) 开展党的自我革命的不竭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对我国反腐倡廉历史的研究和挖掘,多次强调要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认为通过这样的借鉴和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25](P390)}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能够为开展党的自我革命提供不竭动力。首先,忧患意识是自我革命的思想前提。一百多年来,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推动我们党经历数次重大转折,不断锻造强大的生命力。新时代以来开启的全面从严治党正是对曾经一段时期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纠正,并以刀刃向内的强大勇气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其次,自省观念是自我革命的心理基础。做到以史为鉴,争取历史主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长期追求和精神特质。^[26]延安时期,毛泽东曾经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甲申三百年祭》当作重要整风文件。以史为鉴的自省观念有助于党吸取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不断完善自身的理论和实践。再次,清廉人格是自我革命的主体要求。党的自我革命内涵着中国共产党对于道德的认知、选择、实践和追求,^[27]这些伦理意蕴反过来又要求干部以清廉人格作为行为准则。最后,法治约束是自我革命的力量保障。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没有法治,而只有法制,但并不否认,法制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两创”方略就是要将传统法制文明转化发展为现代法治文明。在现代法治文明中形成的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权力监督的重要论述,致力于通过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牢牢抓住“关键少数”等多种举措实现治权上的自我革命。^[28]

(三) 培养干部思维能力的生动教材

新时代开展党风廉政建设,需要多管齐下,关键一环便是干部教育培训,发挥着组织塑造

的功能,集中体现为思想淬炼、能力提升、共识凝聚等多个方面。^[29]其中的能力提升就指向思维能力。通过教育培训工作,尤其是通过情境嵌入的参与式培训^[30],能够增强干部思维能力,从而提升他们对腐败行为的警觉性和抵抗力。首先,忧患意识有助于增强战略思维能力。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国际著名学者戴维·麦克利兰(D.McClelland)认为,战略思维能力是领导者最为根本的胜任力^[31]。“要强化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32]只有居安思危,干部才能更好地把握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风险的存在,从而在决策和行动中更加注重长远利益和全局考虑。其次,自省观念有助于增强历史思维能力。“历史发展有其规律,但人在其中不是完全消极被动的。”^[33]现实中出现问题,能够从历史中找到答案,因为历史上往往发生过,或者历史的经验能够为当今提供启示意义。再次,清廉人格有助于增强底线思维能力。底线是事物变动的分界线、做人做事的警戒线,不可踩、更不可越。讲究为政以德的清廉人格,意味着具备自我约束的能力。党员干部要“守住做人、处事、用权、交友的底线”^[34],在面对各种诱惑能够不为所动。最后,制度文明有助于增强法治思维能力。在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应该通过理解和把握古代惩贪肃吏的法制文明建设来反观当下。不违法乱纪,不突破原则,心中有戒律,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

五、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阻碍因素

国家之间的竞争不仅体现为经济硬实力的竞争,还体现为人才和制度的竞争,而这些归根结底体现为文化软实力的竞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35](P155)}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凝结着古代中国人民的智慧结晶,

也在当今时代具有宝贵价值。推动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是文化战线的大事要事。然而，当前还存在着多重阻碍。

（一）在拓展空间方面，传统文化遭遇现代文明挤压

在农业文明被工业文明超越之后，传统文化也遭遇着现代文化的残酷竞争。而工业化的加快推进、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都在挤压着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存空间。一方面，民族地区或者地方性的物质性文化面临保护困境。民族文化遗产创新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及现代化进程中人们对历史文化的现状所作出的反应，也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表现。^[36]一些古村落、民族服饰、民族建筑等，不仅是历史文化的见证，更是民族文化的载体。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不少古村落面临着被破坏、被遗忘的风险。比如，被康熙称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龙，其墓葬位于山西省方山县，曾两次遭到严重破坏，而历史上其他众多廉吏的遗址，也没有得到很好保护。^[37]另一方面，不少地方的非物质性文化遗产面临传承难题。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简称“非遗”，依附于个人、群体或特定区域空间而存在，是一种活态文化。^[38]虽然有些地方成功地推动了当地的廉洁文化建设，比如，云南省双柏县挖掘彝族民间谚语和傩祭舞蹈“大锣鼓”等传统资源，收集整理100多块廉洁警示语，构建“本土化”的清廉文化阵地^[39]，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和生活方式的变化，许多人对传统文化活动的参与度逐渐降低。

（二）在思想认识方面，部分人对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存在偏见

首先，社会上部分人对传统廉洁文化的价值认识不足。一方面，有人认为传统廉洁文化无法适应当代社会发展。作为封建时代的产物，传统廉洁文化相对保守，并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其所强调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无法完全满足现代社会的多元化需求，难以激发年轻群体的兴趣。另一方面，有人持有“文化自卑论”的观

点^[40]，认为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在国际化的潮流面前缺乏优势，而西方文化在科学、技术、管理等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具有更强的竞争力和适应性。其次，相关主体对推进传统廉洁文化转化发展的认知不足。作为“两创”实践主体，文化传承人、文化管理人与文艺创作者等发挥着关键作用，但许多人认为，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转化发展主要通过网络化来实现，即将内容文本整理后上传至互联网。然而，这种简单的理解不足以将传统文化与数字化时代的应用场景有效结合。此外，在进行传统廉洁文化教育宣传时，有些人仍沿用原有教义材料，未充分考虑现代社会的实际情况。再次，有些地方管理者对传统廉洁文化宣传和保护的意義认识不足。出于官员晋升锦标赛的作用^[41]，不少地方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仍然以经济发展为主，对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宣传和保护工作不积极，投入和保障不足，从而出现了“上头热，下头冷”的情况。

（三）在动力支撑方面，相关文化主体缺乏内在动力

首先，文化传承人动力不足。长期以来，文化传承人的培养工作未能取得预期成效，主要在于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人文教育、美育普及等关键问题。诸多文化传承人的文化素养未能达到应有的传承与引导水平。^[42]他们在“两创”过程中倾向于沿用传统的表达形式，对于探索新方法持保守态度。其次，文化管理者动力不足。戏剧院、文化馆等文化场所面临着经营困难和竞争压力。部分戏剧院团虽为事业单位，但其员工收入并不完全依赖于财政拨款，相当一部分收入需依靠市场经营。在此背景下，文化管理者往往将主要精力投入到提升票房收入、增加观众数量等短期目标上，而缺乏对廉洁文化转化发展的长期规划和精心打磨。再次，廉洁文化企业缺乏开拓的动力。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国文化企业商业模式尚存在着价值链条过短、盲目跨界失败等困境^[43]，导致缺乏开拓动力。一方面，某些文化企业对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市场

前景缺乏信心,认为廉洁文化在现代市场中的竞争力较弱,难以吸引足够的观众和市场份额;另一方面,部分廉洁文化企业的原创能力不足,所推出的文化产品存在品质不高、呼应现实需求不足、模仿有余而新颖性缺乏等问题。^[44]

(四)在工作推进方面,有些地方领导存在畏难心理

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诸多地方政府在推进此项工作时,往往缺乏实质性的努力,仅限于表面形式,或仅为了迎合上级检查。除地方政府对廉洁文化建设重视不足外,该工作本身所具有的敏感性也是导致此现象的原因之一。部分地方领导对此抱有畏难心理。传统廉洁文化之所以能够历久弥新,是因为其深植于反贪嫉腐、扬善惩恶等核心价值观念之中。诸如《三国演义》中“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以及《西游记》中“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情节,均是这些理念的生动体现。其他以廉洁为主题的文化艺术作品,更是直接揭露和批判了贪污腐败现象,向公众传递了正直清廉的价值导向。然而,当文化艺术作品以幽默或讽刺的手法揭示官场腐败时,地方领导干部便产生了忧虑。他们担心这些作品对当地干部廉洁形象造成负面影响。因此,在处理此类题材时,地方领导通常持审慎态度,深感肩负重大责任,担心在宣传与表达过程中出现失误。这种忧虑宛如无形的枷锁,限制了他们可能的创新举措。作为职能部门的宣传机构可能面临更大的“担责”压力。

六、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实践路径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应该建立在对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间的精准把握之上,具有强烈的务实精神和现实针对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为中心。”^{[45](P5)}就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而言,“两创”的推进思路应该针对以上的阻碍因素而提出切实可行的破解思路。

(一)加强各领域的机制与文化建设,营造有利于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良好环境

以上的许多阻碍因素都跟环境有关,因此应着眼于从以下方面营造良好环境。首先,改变过去只注重对公职人员的内部监督,而要加大对他们的外部监督。当前,尤其要畅通自媒体平台的舆论监督机制。其次,加强教育领域的廉洁文化建设。教育是培养人才的关键环节,传承和弘扬廉洁文化应当从教育开始。高校应积极探索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应然路径,以理想信念教育为引领,以诚信教育为根基,以课程思政教育为阵地,以自我教育为依托,以实践育人为载体,以网络育人为平台,切实增强大学生廉洁教育的实效性。^[46]再次,加强工商领域的廉洁文化建设。企业应当加强内部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拒绝内部的贪污腐败。政府职能部门应当加大对企业的监管力度,完善公正透明的市场环境,打击不正当竞争和商业欺诈行为。新时代以来,针对国企的反腐败斗争没有停息,而这自然离不开廉洁文化建设。^[47]民营企业内部腐败也应受到重视,加强民营企业廉洁文化建设,有利于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机制,培植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48]

(二)抓住人才这一核心竞争力,通过培养文化主体的创新思维意识来增强内在动力

人才是决定性要素。各地应该大力抓好人才的发现、培养和引进,尤其要聚集一批地方特色廉洁文化人才。比如,2022年8月,贵州省纪委监委建立“清廉贵州”建设人才库,将来自3个民族自治州、11个民族自治县的195名干部纳入人才库,用少数民族干部群众熟悉的语言宣传正风肃纪反腐成果。^[49]针对文化主体的动力不足问题,一方面,应该培育文化传承人的创新思维。不能再以传统技术、传统方法来应对新的时代需求,而应该主动适应数字时代的文化传播特点和文化发展规律,以及需要了解年

轻人的需求状况,因此需要培育文化传承人的科技思维、市场思维和方法思维。另一方面,增强文化管理者的创新意识。文化管理者应转变角色,从过去的政府“办”文化、“管”文化的角色转向更加积极的“引”文化角色。聚焦社会需求完善相关政策,为“两创”工作提供资金、场地、人才等方面的支持。比如组织各类文化交流活动,建立专门的创新基地或孵化器。在不少民族地区,传统文化十分深厚,可以深入挖掘其中的廉洁元素。近年来,云南省楚雄州为了发挥彝族文化教育人、引导人、塑造人的作用,当地纪委监委积极作为,引导文化企业创作推出三季《中国彝族古训文化》微动漫作品,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50]

(三) 重视并保护本土特色文化资源,运用数字技术优化传统廉洁文化转化发展的方法路径

针对形式传统、方法单一、路径狭窄等问题,要明确创造性转化的重点是聚焦“继往”“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重点在于补充和拓展中华传统廉洁文化,聚焦“发展”“开来”。^[51]因此需要坚持守正创新并优化方法路径。首先,加强文化保护,发挥载体功能。政府应该加快制定相关政策和法规,明确责任和权益,确保古村落、民族服饰、民族建筑等廉洁文化载体能够得到有效保护与合理的开发利用。其次,利用本土资源,释放文化活力。鼓励各个地方突破传统思维,结合自身特点来推动“两创”工作,特别是要深入把握地域文化和谐共生的关系,比如,有些地方的特色方言、廉洁歌谣、廉洁戏剧等,蕴含着诸如忠诚、平等等价值观念。古代出现纠纷诉讼时,民众往往会祈盼“青天大老爷”主持公道,大量话本戏剧和史料记载反映了民众这种心理。^[52]通过方言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一个地区的历史变迁、风俗习惯以及人们的思维方式。再次,推进科技赋能,优化表达形式。可以将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于文化场馆建设中。^[53]比如,首都图书馆自主研发原创动漫短片数字资源库“首图动漫在线”,持续打造少

年儿童文化精品内容,涉及中华传统美德修养、荣辱观教育、文明礼仪教育等,对青少年起到正向积极引导作用。^[54]

(四) 深化管理体制和机制改革,激励干部在推动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上积极作为

应该按照《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若干意见》,充分鼓励干部大胆作为,建立健全在文化创新发展方面的容错机制。一方面,通过创新体制机制,鼓励地方领导干部“走出去”,与学术界、专家学者等进行广泛的沟通与交流,加深对廉洁文化建设的认识,减少对廉洁文化宣传的畏惧。在此基础上,加大与相关文化企业的合作力度,积极创作优秀作品。比如,贵州省搭建由宣传部门、纪检部门、文化企业、专家学者共同构建的合作平台,推出了京剧《阳明悟道》、民族音乐会《高原·听见贵州》、芭蕾舞剧《白蛇传》等优秀作品。2023年10月,贵州省推出的弘扬廉洁文化的大型历史电视连续剧《丁宝桢》登陆央视八套黄金档。数据显示,开播首日,该剧以0.7219%的实时收视率位居全国黄金档第一位。最后两集收视率达2.0234%,市占率9.9125%,遥遥领先同期同时段热播电视剧。^[55]另一方面,为确保传统廉洁文化转化发展过程中不出现问题,有必要建立健全科学透明的文化审查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增强担当意识,鼓励有所作为。特别要列出负面清单,明确哪些行为不能做、哪些内容不要碰,以便一目了然。这样能够避免政治上的错误和不当表达,减轻宣传部门的压力;同时确保传播廉洁文化的方式和内容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且与中央要求保持一致。此外,还能有效保护创作人士或艺术家的创作自由。

七、结语和讨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56](P238)}源于古代社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带有农耕文明的固有特点,但却在工业文明时代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而要使“旧文化”发挥“新作用”,就

需要在“两创”上做出努力。社会历史条件的不断变迁、廉洁文化迭代新生的自身需要以及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需求，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廉洁文化“两创”的必要性。尽管现代社会已迈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与数字文明的新纪元，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两创”面临诸多挑战，但必须秉持勇往直前的坚定态度。

正如前文所指出，廉洁文化不同于廉政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观，具有广泛的社会意义。在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中华传统廉洁文化强调清心寡欲、注重勤俭朴素、主张节约节省，^[57]这既是一种高尚品德，也是一种崇高人格，为民众所推崇，也为国家所倡导。但在物质产品极为丰富的现代社会，消费、投资和生产成为并驾齐驱的“三驾马车”。促进消费成为国家的顶层设计，大众的消费文化观逐渐兴起。究竟如何看待并怎样协调传统廉洁文化与现代消费观念之间的关系呢？

实际上，两者并非对立。一方面，廉洁文化与现代消费观念并不完全矛盾。廉洁的官员和节俭的民众可以共同营造健康的消费环境。官员的廉洁自律可以避免奢侈浪费，杜绝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为消费市场的公平竞争提供有力保障；而民众的节俭观念则可以引导消费者理性消费，避免盲目攀比。另一方面，廉洁文化强调节俭，这是对消费行为的一种规范和约束。消费不应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而应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的消费模式。当然，政府职能部门也应加强监管和引导，防止过度消费和浪费现象的发生。

当今社会，“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仍然比较突出”^{[58] (P6)}，一些人受到金钱、权力、美色等诱惑，放纵个人欲望，导致私欲膨胀，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邪路。这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社会的世俗化转向所导致。虽然个人追求正当利益是被鼓励和认可的，但部分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奉行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不再注重勤俭节约。这样的行为不仅对个人的道德品质构成威胁，也对社会的公共

利益产生了严重危害。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艰苦奋斗、勤俭节约，不仅是我们一路走来、发展壮大的重要保证，也是我们继往开来、再创辉煌的重要保证。”^[59]因此，广大公民应该深刻认识到贪欲无止境的严重危害，并充分理解过度消费和浪费给自己和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新时代迫切需要创新发展“勤俭节约”这一传统美德，强化全民的节约意识、环保意识和生态意识，从而更有效应对全球性粮食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问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N]. 人民日报, 2023-10-09(001).
- [2] 臧峰宇. “第二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J]. 中国社会科学, 2023(8): 28-33, 205.
- [3]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2.
- [4] 冯友兰. 三松堂全集：第一卷：[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5.
- [5] 田文军. 冯友兰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3: 348.
- [6] 李丹丹, 柴文华. 论贾谊对儒家伦理思想的转化和创新[J]. 求是学刊, 2018, 45(1): 45-50.
- [7] 柴文华, 冯丽华. 对康有为与儒学关系的几点思考[J]. 学术交流, 2018(1): 37-41.
- [8] 尹世尤, 沈其新. 论晚清封建廉吏对中华传统廉洁文化的传承[J]. 江西社会科学, 2008(3): 130-134.
- [9] 李焕旺. 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J]. 理论导刊, 1992(3): 39-40.
- [10] HUSTED B W. Wealth, culture, and corrup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9, 30(2): 339-359.
- [11] 杜治洲. 廉洁文化的基本内涵、形成机理与建设策略[J]. 理论探索, 2023(4): 68-74.
- [12] 习近平.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人民日报, 2022-10-26(001).
- [13] 闵雪. 新时代廉洁文化：从自在走向自觉[J]. 长白学刊, 2024(1): 47-55.

- [14]李辰洋,魏俊琰.意义、问题与路径: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J].文化与传播,2018,7(2):8-12.
- [15]十三经注疏(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16]薛安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探析[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9,42(6):44-47.
- [17]周奇,金滢坤.论隋代察举制向科举制的转变[J].人文杂志,2022(5):129-140.
- [18]王洪兵.清代州县治理的制度设计、实践困境与应对举措[J].江西社会科学,2023,43(4):130-147,207.
- [19]张桂林,周睿志.比较政治文化视阈中“廉”的概念研究——廉政建设的价值分析[J].政法论坛,2019,37(5):3-12.
- [20]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牢记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历史警示为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有益借鉴[N].人民日报,2014-10-14(001).
- [21]张传开,单传友.文化自信的本质及其当代意义[J].教学与研究,2021(9):41-47.
- [22]杨光斌.中国民主模式的理论表述问题[J].政治学研究,2022(1):16-20,156.
- [23]千在实处 勇立潮头——习近平浙江足迹[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4]蒋国宏.中国传统廉政文化的软实力价值考量[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36(1):25-31.
- [2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8.
- [26]张林,田克勤.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主动的理论意蕴及其深刻启示[J].思想教育研究,2022(12):61-67.
- [27]李伏清,庞艳.中国共产党推进自我革命的伦理意蕴[J].道德与文明,2023(1):15-25.
- [28]李新廷.规范权力与自我革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阐释及其价值[J].社会主义研究,2023(4):74-81.
- [29]陈家喜.论干部教育培训的组织塑造功能[J].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3,27(3):26-33.
- [30]NOE A R, CLARKE D A, KLERN J H. Learning in the Twenty-First-Century Workplace[J]. Annual Review of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014, 1(1): 245-275.
- [31]SANCHEZ I J, LEVINE E L. What is (or should be)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mpetency modeling and traditional job analysis? [J].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 2009(2): 53-63.
- [32]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求是,2022(17):4-17.
- [33]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13.
- [34]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359.
- [3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37]张伟.学者呼吁加强廉文化遗产保护利用[N].中国文物报,2019-11-12(003).
- [38]东宇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述评[J].贵州民族研究,2022,43(3):89-95.
- [39]徐燕梅.“廉珠成串”培育尚廉风尚[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01-14(002).
- [40]杜振吉.文化自卑、文化自负与文化自信[J].道德与文明,2011(4):18-23.
- [41]余绪鹏.官员晋升锦标赛:经济增长的政治逻辑——基于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J].华东经济管理,2016,30(6):88-95.
- [42]杨海龙.文明因交流而多彩 文明因互鉴而丰富[N].中国纪检监察报,2019-03-04(004).
- [43]潘爱玲,刘文楷,邱金龙.困境与突破: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文化企业商业模式创新研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30-37.
- [44]刘建萍,王天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文化创新发展探究[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12):44-53.
- [4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 [46]刘宏宇,熊治东,张涵.新时代大学生廉洁教育刍议[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2):75-77.
- [47]杜治洲.深化国企领域腐败治理[J].人民论坛,2023(15):52-55.
- [48]贾宇.民营企业内部腐败犯罪治理的体系性建构——以《刑法修正案(十一)》的相关修改为契机[J].法学,2021(5):73-89.
- [49]曹溢.涵养崇廉尚洁时代新风[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07-14(001).
- [50]徐燕梅.“廉珠成串”培育尚廉风尚[N].中国纪检监察报,2023-01-14(002).
- [51]郭丽瑾,肖周录.习近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逻辑理路[J].学术探索,2022(10):53-59.
- [52]何勤华,邓丛.“执法如山”的文化意蕴及其当代传承[J].社会科学,2024(2):171-179.

- [53]杨姗,吕静,夏梦一.博物馆数字化体验与观众在线契合行为[J].深圳社会科学,2024,7(4):140-150.
- [54]曹雅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廉洁文化在新时代熠熠生辉[J].中国纪检监察,2023(18):34-35.
- [55]赵相康.文旅融合好戏连台[N].贵州日报,2023-11-05(002).
- [56]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历史[M].田时纲,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 [57]伍洪杏.中国传统廉洁文化的伦理检视[J].理论探索,2022(2):12-17.
- [58]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
- [59]习近平在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 守护好祖国北疆 这道亮丽风景线[N].人民日报,2019-03-06(001).

【责任编辑 刘婉华】

The Old State and New Destiny of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YU Xupeng

Abstract: Promo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wo creations”)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s a major contribution of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f we compare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o an “Old State”, we will find that achieving its “two creations” is a “New Destiny”. Upholding the tradition of “explaining the Old State to support the new destiny” in Chinese culture and responding to the world’s expect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can help promote cultural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has rich legacies with significant contemporary value. It is the historical source for enhanc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strength, provides an inexhaustible driving force for the Party’s self-revolution, and serves as a vivid textbook for cultivating the thinking ability of cadres. The “two creations” strategy for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is a practical need for promoting “the second integration” and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constraints on the “two cre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further efforts must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areas. The first is to strengthen mechanism building in all fields to create a favorable environment for the “two cre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Secondly, we should seize talent as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and enhance internal motivation by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ve thinking awareness of cultural subjects. Thirdly, we should attach importance to and protecting local cultural resources with distinctive features, and optimize the methods and path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integrity culture through digital technology. Lastly, we should deepen the reform of the management system and motivative cadres to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two creation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integrity culture.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the second integration”;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egrity culture; fighting against corruption